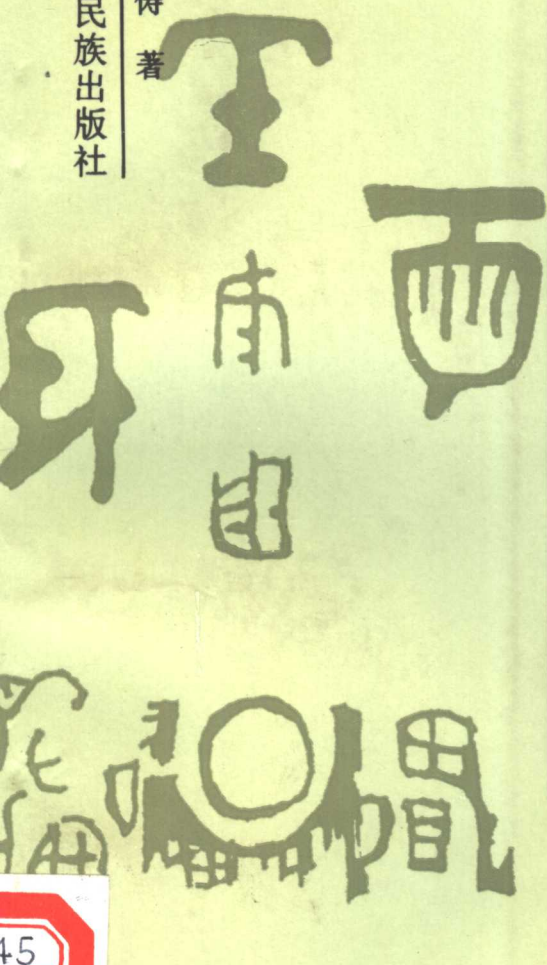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红岩碑初考

吴雪俤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貴州紅岩碑初考

李



(黔)新登字 04 号

责任编辑:谭良范

封面设计:吕凤梧

勘 校:谭用中

贵州红岩碑初考

吴雪涛 著述

李 盛 协编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:550001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:5.150 千字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7-5412-0601-6/K·53

定价:8.8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贵州红岩碑初考》一书，是吴雪俦同志的遗作，现由贵州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会资助出版，委托本人审读、勘校并撰写有关出版说明和后记。

一、红岩碑在关岭县城郊晒甲山上。本世纪60年代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以其非摩非刻，定名为“红岩古迹”。但研究者沿用旧称之习惯难改，故于《贵州红岩碑初考》书名，未按摩岩碑刻的科学要求予以订正。

二、在历史上，何人首先发现红岩碑，不见文献记载。如果从明嘉靖年间普安州人邵元善作《红岩》诗算起，距今有四百余年。邵元善笔下的红岩碑，削立千丈，刻画盘回。文字诡奇变幻，有的“作鼎钟形”，有的“成飞走象”，有的好似传说中诸葛亮与彝人诅盟所绘“图谱”。尔后数十年，间有二三学子题咏红岩碑，但人微言轻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。清康熙年间，贵州巡抚田雯著《黔书》，谓“黔永宁有诸葛公碑”。这是红岩碑作为文物古迹首次载入史册。此后又沉寂了一百多载，至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邹汉勋修《安顺府志》，在“古迹”篇发表

了红岩碑二十五字释文，定为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，并推崇其历史文物价值，可以“上齐禹碑，下陋秦石”。从而引起国内考据学家的极大兴趣，作为研究和度藏之用的红岩碑拓本、摹本、缩刻本遂纷纷面世。光绪年间刘心源不满意邹汉勋释文，乃另为新解，由曾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的陈矩精印发行。日人德凡作藏、鸟居龙藏获悉后，亲自来黔索书，归而分藏于“帝国大学堂两图书馆”及一些学校和寺院，轰动了日本学术界，阅者摩肩接踵，有如“洪都观经”云。这红岩碑究为何物？学者们研究了百数十年，广征博引，各抒己见，迄无定论，具影响力者有“三危禹迹”、“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”、“诸葛碑”、“少数民族文字”和“自然石花”诸说。70年代以来，贵州有些史学工作者欲解此“千古之谜”，发表过“探秘”文章多篇，尽管“破译成功”之类的新闻曾见诸报端，但在学术界却无“认知”效应。

三、吴雪涛先生所著《贵州红岩碑初考》一书，不仅系统地概括和分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而且从历史、民族、天文、地理各领域进行深入的探讨，立论时出新意。据他研究，红岩碑是春秋时代牂柯国牂族古文遗迹。对于碑文，他作了独僻蹊径的诠释，谓其上“除石花及圈文外，共有两字脱文，实有五十四字。”“四个字联成一句的共有三句，六个单字联成一句的只有一句，其余均是一个一个的单字。”当中，“除风、雪、地、天四字，子、

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十字及卅字可以确定外，”还有“四字”尚未考出，但以风、雪、地、天之例推之，恐为四个名词的联写，尚未达到组成文的程度。”他说，该碑的制作，“是就岩石平滑处打磨而成的。但因面积过大，磨制技术过粗，只能大体做到光滑。”文字确非人工镌刻而成，“系施工时将岩面剥深五六寸许，用汁液书于其上的。岩石系红色，字则为青灰色，故有‘字青石赤’之称。”字的结体间架，“都同于中国的钟鼎篆籀”，处在“卅族初有文字”阶段。

四、贵州省社科出版基金委员会同意资助《红岩碑初考》一书出版，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：第一、尽管《初考》的结论没有超出“少数民族文字”范畴，但对形成时代、内容、字体等方面的研究，能持之有故，自成体系。做为一家言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；第二、《初考》对于每个问题的提出、讨论和解决，都是独立思考，发表个人意见。正确与否和盘托出，不含糊，不矫饰，不人云亦云，不倚傍门户。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，在任何时候都值得鼓励与提倡；第三、红岩碑做为省内著名古迹，令人翘首以待的是识破它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为此，应当调动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、地质学乃至物理化学等各种科研手段和技术，群策群力，共同攻关，加上必要的经费和时间，或可感动上帝，解决问题。吴雪俦先生所撰《贵州红岩碑初考》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集成专著，恰

好适应了这种需要,对红岩碑学研究工作,必能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五、我们认为《红岩碑初考》一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,毋庸置疑。然而,必须实事求是地将其不足之处和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奉告读者,这就是:第一、我们充分肯定了吴雪涛先生为研究红岩碑所作的种种努力,并不意味着认同书中结论。学术界朋友可以在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发表争鸣意见;第二、如前所述,吴雪涛先生研讨历史问题的突出优点,表现在勇于探索,时出新意,居高临下,言无顾盼。但负面亦由此而产生。如说牂柯古国出自吴越江淮之间,至战国时期始迁入贵州;说秦常頊略通西南五尺道的“五尺”,即“乌氏”之夷音;说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主要民族分别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蔡族、蒙族和中古时期的清族;说《史记》中之“巴寡妇清”出身于“清族”,“乌氏倮”出身于“乌族”;说今滇黔境内一切带有“乌字”和“箐字”的山名水名,都是历史上“乌族”和“清族”的统治遗迹,等等。读之如履薄冰,令人惶恐。但吴先生谢世有年,已不可能建议其进行适当修改。现在做为遗著出版,尽可能保存原貌,审稿人和编者只需为书中的行文润色,为引文补遗,不宜越俎代庖改动基本观点及其论述。任何一个层次的读者,面对作古学人不会求全责备;第三、《红岩碑初考》一书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古籍。

其中,有些引文需要加以诠释,方能说明问题。在这方面由于吴先生带有“为我所用”的倾向,势必出些纰漏。如引《禹贡》“梁州”条下“蔡蒙旅平,和夷底绩”二语,他将蔡、蒙、和夷释为上古时代三种民族;“底”释为“皆”,“底绩”释为“全部皆是纺绩。”其文曰:“《禹贡》的梁州,在尧舜时期有三个民族居住,一个是蔡族,一个是蒙族,一个是和夷之族。这三个民族,蔡、蒙两族都在梁州边区,即今四川大渡河、青衣江两流域。蒙山蔡山都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名字。和夷之族,在梁州中部。这三个民族的文化情况:和夷已经与中原先进民族一样了,纺织业很发达,都是织布为衣。”这种“新解”完全背离了文字本意和历史事实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原文:“华阳黑水惟梁州。岷嶓既艺,沱潜既导,蔡蒙旅平,和夷底绩。”这是关于夏禹梁州治水的情况综述。具体到“蔡蒙旅平,和夷底绩”二语,《十三经注疏》集汉唐学者考证意见,指出“蔡蒙为梁州境内二山名,和夷乃平地之名。”“底,致也,定也,平也。”“底绩”即“致功可艺”。这是说夏禹治水大功告成,无论蔡蒙山区或和夷平地,滔滔水患已除,均可开伐垦殖了。由此可见吴先生的“新解”,离谱甚远。又如引《尚书·禹贡》“五百里要服,三百里夷,二百里蔡。”他将“夷”、“蔡”释为两个民族,“要服”释为“遮蔽下半身”的皮革。其文曰:夷蔡“这两族的文化比较落后,当时还是要(腰)服阶段,即用一种皮革之

类遮蔽下半身，而裸其上身，所以谓之要服。”那么，《禹贡》中“五百里要服”的“要服”是否是“遮蔽下半身”的皮革？“三百里夷”的“夷”和“二百里蔡”的“蔡”是否是古代两个民族？它们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？汉唐学者在《十三经注疏》《禹贡》中早已做了系统研究和明确回答。

大禹治水之后，九州攸同。为使“赋役有恒，职掌分定”，遂以京师为起点，按道里远近，将全国划分为五类地区，叫做五服。郑玄云：“服，治田出谷税也。”每服五百里。京师以外叫“五百里甸服”，甸服以外叫“五百里侯服”，侯服以外叫“五百里绥服”，绥服以外叫“五百里要服”，要服以外叫“五百里荒服。”《国语》给五服以定性称谓，曰“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卫宾服（即五百里绥服。引者），蛮夷要服，戎狄荒服。”这五服的贡纳趋势是近多远少。具体地说，甸服去京师最近，赋税最多。百里与二百里俱纳禾藁，三百里服藁役，四百里纳粟，五百里纳米；荒服去京师最远，“力役、田税并无”，政教“听从其俗，羁縻其人耳。”关于要服，《禹贡》曰：“五百里要服，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。”正义云：要者约束之义。夷，平也。守平常之教，事王者而已。蔡，法也，法：三百里而差简，言其不能守常也，故差役比夷还要简易许多。总的说来，要服逼近戎狄，久慢王化，既无“委以兵武”之责，赋税又减少到最低限度，其主要任务是宣扬

文教,约束远人,使之拥护中央王朝的统治。这与吴雪俦先生“要服、夷、蔡”新解,不啻有霄壤之别。

书中类似情况尚多。如将《尚书·舜典》“蛮夷猾夏,寇贼奸宄”中的“滑”释为“华族”,“寇”、“贼”、“奸”都释为“中国古老民族”,“宄”释为“鬼族”等等,并分别展开振振有词的论述,于此等处读者其审辨之!

贵州省博物馆 谭用中

1995. 1. 20

序

《红岩碑初考》是我的朋友吴雪俦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写成的。因为我对红岩碑也有同好，经常互相研究讨论，定稿时他约我作协编人，所以我对他写成此书的经过，知道较多。值得在此谈一谈。

红岩碑于60年代初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今贵州关岭县不远的晒甲山一赭色岩石上，故名红岩。碑高约丈余，横约两丈余，碑文共五十余字，大小不一，大字约尺余，小字仅数寸，不是刀斧镌刻，是用一种黑色的物质写成的。落日西斜，光射岩上，远处清晰可见，故有“字青石赤”之语。但是文字奇古，形同篆籀，又不同于中国篆文，至今无人认识。它的拓片，从清末以来就流传国内外，藏者不少，是一种国际性的文物。到过贵州的人，凡留意金石文字的，都知道红岩碑这一古迹。凡看过红岩碑的拓片的，都欣赏它的雄奇瑰丽，虬结龙蟠。但是它的内容说些什么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
我的老家是湖南长沙，父亲李藻清末留学日本学医，并参加同盟会，回家后在革命中牺牲。他喜欢中国文学，更喜欢中国金石文字。家中有一套《红岩碑》拓

片，朱色四幅，形同挂屏。父亲死后，仍遗藏家中。我十多岁时，清理家中书籍文物，曾经见过，光彩射人，比之其它名家篆书手迹，雄奇何止十倍，但只不识其文字。问之吾母，知是父亲珍爱之物，名红岩碑，由贵州购来。小儿好奇，私想长大后，当努力研究，必须彻底了解其内容。以后每遇乡里先达，博学通雅，便以红岩碑内容请教，但亦始终没有解决。记得一九三八年徐特立老先生返长，来看我的季叔母（我的季叔李烈源，是徐老门生，师生情笃，徐老在长时，经常过从，季叔死后，季叔母欧阳涤尘，抚孤守节，徐老回湘，必来看望），晤谈之下，我向徐老请教红岩碑的内容，徐老说：他见过碑文真是奇古，但不识其文字。谓我如有兴趣，可多收集资料，加以研究，总有了解之一日。抗战时期，我在湖南安化县东坪银行负责，日寇侵湘、仇鳌（亦山）老先生来东坪避难，因他和我父先后留学日本，又同是同盟会员，革命同志，喜欢东坪雅静，就来我处暂住。我的朋友周怀智（湘潭人，国民党中茶公司湖南公司经理）罗世麟（新化人，国民党交通部川湘联运处分处处长）来看仇老，周嫌我客厅单调，赠我墨拓红岩碑一幅，系公司同事邹君所赠，邹君先人邹汉勋孝廉在贵州安顺府修志书时所得（即本书附件第一种拓本）。罗说：他也有一幅朱拓的红岩碑，其文留学日本时所得，中间还有一个大虎字（即本书附件第四种拓本）承认送我，和墨拓本

共悬室中，以增雅趣。此二拓本，我一校对，真是互不相同。只有墨拓本和我家以前藏者一样。一日曹典球（号子穀，长沙人，时避难居安化县城，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、长于书画金石）老先生来看仇老，见红岩碑双拓，曾问仇识否？仇曰：不识。曹曰：对此我曾研究过，墨拓是邹汉勋孝廉由贵州携回。太平军兴邹参李续宾戎幕，三合之役，一同遇难。其人博学多才，万分可惜。朱拓系长沙瞿鸿锡任贵州安顺知府时所拓，与墨拓本全不类，但两本文字我都不识，无以辨其真伪。仇曰：往昔我在南京时，与彭汉怀先生（国民党铨叙部次长，书画金石均很有名）曾看过红岩碑拓本数种、除此两种外（指我屋中所藏悬者）还有一种，系胡林翼之孙辈（忘其名）所藏，云系欧阳予倩家得之张之洞督两湖时所赠，字数较多，又不同于此两种，我与彭汉老亦不能辨其真伪。（所说是否本书第二、三种附件，不得而知）我说：我的看法有虎字的红岩碑是假的，因其文字不像字形，其碑中也不会羼入一草书虎字。无虎字的是真碑，其结构与篆书金石无异，与我家原有者相同。但以不认识其字为憾，二老谓我的意见甚是，要我继续研究。一九四二年，我往良丰探望爱人，至桂林，拜会欧阳予倩先生，他和我们是通家熟识，其时郭沫若先生和田汉先生也在座，都是熟识的。晤谈中我以红岩碑请教，欧阳先生说对此他无研究。他家旧有藏本，也不知散落何处了。我问郭沫

若先生和田汉先生,他们也说不识。并说他们过去都曾看过拓本。郭先生看过两种,一种有虎字,一种无虎字。田先生看过一种是有虎字的。他们问我可曾研究过?我说:正在研究,但无结果。他们鼓励我继续研究。一九四八年我调职到贵阳,欲往访任可澄先生,请教红岩碑事,听说已逝世,此愿未偿。

贵州解放后,一九五〇年,得交吴雪俦同志,他时任贵州文教厅副厅长,有一次谈到贵州文物古迹,我想起红岩碑,他说这是贵州最珍贵的古迹,但问题复杂,知者甚少。我谈及我对此颇有兴趣,但所知不多,因简述过去研究此碑的经过。他约我有空再作详谈。经过多次交换意见,我才知道他对此有深邃的研究,并且已几十年了。他正在写红岩碑的专研著作,尚未完稿。一九六四年,他的《红岩碑初考》写成了,我请求先读为快;并说:将来如需清稿,复写、校核,我都愿尽力帮忙。现在这本书算是复写出来了。这是吴雪俦同志一生中一件有意义的好事,也是我对红岩碑渴求解决的一种满意的达成。

《红岩碑初考》是一本学术著作。必须要事事有科学根据,说理精密,引证详切,作者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,对红岩碑的发生、发展及其作用,都作了系统的叙述,使每个读者读后,对红岩碑的内容,都能得到全貌的了解。

《红岩碑初考》有几个特点值得向读者介绍，第一，红岩碑是不是文字？如果是文字是甚么人或甚么族的文字？因此他就在中国文字学中寻根究底，把中国所有各种文字加以比较研究，断定是春秋时候濮族的文字，亦即后来夷族的文字。这是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解决了。

第二，红岩碑是濮族的文字，濮族是什么时候到贵州来的呢？他从民族学上逐一加以研究和考察。他从尧舜时候到过贵州的民族起，至最后到达贵州的民族止（他说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繁荣昌盛了。《尚书》中所记载的内容，都是可靠的。可惜直至现在尚无人真正了解其内容。他准备在所作中国古代史中，再详细叙述。）一一加以发掘。这样，凡是到过贵州的民族，其族源、族史，都得到充分的说明，譬如鬼方之族从汉代到现代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他给以彻底解决了。如此种种，在中国民族学上解决了不少的大问题。

第三，由于要解决红岩碑的问题，便由文字学牵扯到民族学，又由民族学牵扯到历史地理学。中国历史上和地理学上的一些繁杂问题，便接踵而来了。譬如濮夷之族，怎样会到贵州来呢？这就牵涉到周宣王大伐濮夷，如何进兵？如何决战？如何善后？对周代的国势起了那些影响？从《国语》《史记》到以后的历史记述都是未解决的问题，本书给它解决了。牂牁之族，在齐桓公

时还是在江南一带，参加了葵丘之会，如何会到贵州来呢？本书给它解决了。此外，凡属到过贵州的民族，原在何处，后来如何到贵州？本书都给它解决了。这些都是从历史学上和地理学上，引事求证，逐一加以解决的。都是合乎科学方法的。

第四，由于要解决民族学、历史、地理学，又牵涉到中国的古代天文学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生，发展，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十三星、二十八宿，它的名称和分野是怎样得来的，这就要从民族的沿革，历史、地理的变动去寻找。这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，本书给它解决了。

第五，红岩碑的文字，是濮族的文字；红岩碑的内容，是风、雪、地、天等单名词。把这些单名词写在岩石上是什么作用呢？这就要从民俗学上去寻求答案。本书从中国古代民族中的神权思想解答了这一问题，是完全正确的。

最后，我对本书还有一项重要的看法，就是它解决了东南亚主要民族的族源问题，这是今后在亚洲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教育上有重大关系的问题。泰国是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，但它的民族的来源，至今还没有解决。殊不知它是尧舜时代的蔡族展转迁移去的。泰、掸、歹，都是蔡字的音转。缅甸的主族巫族（吴），也是由中国迁移去的，吴是他们的族姓，至今缅甸人的名字上

都要冠一吴字，就是族姓的流传。但是他们知道了，只作为吴字是一种尊称来解释，还有东南亚各地的蒙族、(猛或孟、或木、或莫)也是尧舜时候的蒙族迁移去的。所留下的地名或猛或孟或木或莫的，都是蒙族遗留的痕迹。泰国缅甸一带，有钦族、喀钦族、青冬族、青龙族，也是中国的清族(亦名少昊青)迁移去的。越南、老挝一带的苗族，也是中国的苗族。老挝的主族，即是中国傣族。以上这些民族的族源，他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可供参考。今后由于科学进步，交通发达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一天天发展，这些民族必然会在更多的交往中增进友谊，共同发展。

《红岩碑初考》从字面上不过是一种考证碑文的东西，但实际的内容是文字学、民族学，历史学、地理学，天文学，民俗学的科学综合著作。吴雪俦同志说：书中所引证的学说，仅仅是各种问题的简略结论而已，它的详尽论据，要留待作各种专著时叙述，我对红岩碑研究了几十年，通过这本书的协编，也算解决了一生的愿望。

目前我国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，不但经济工作要现代化，文化教育也要现代化；不但自然科学要现代化，社会科学也要现代化。现代化必须放弃陈框滥套，腐辞诡说，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，大胆努力创新，不为过去一家之言所限制，不为假的冒牌权威之论